



陈颖

美的热恋 力的奔放

中国古代
旅游说薮

旅游教育出版社

引 子

今天，人们都期望社会生活以更加绚丽多彩的面貌呈现在自己面前，也知道从新的方位和角度去认识世界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有效途径，只是，他们或许没有想到，将这种调整了聚焦的视觉镜头对准历史，对准了古代中国，特别是对准了以往人们的旅行游历，又将会意味着什么。

古代中国是一个凝积着相当丰厚精美的文明传统的国度，而中华民族则自古便是一个向往自然，喜好自由，乐于游历，深谙“观光”（《易》）的民族。从上古时代的圣人舜以其“巡狩”的方式揭开这一行程的帷幕以来，数千年来，在山川秀丽、风物壮观的中国大地上，有多少华夏子民以其卓绝的跋涉向世界展示过他们奋进勃发的英姿；又有多少炎黄苗裔以其丰硕的游绩给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添上奇异瑰丽的一笔。这里，有屈子“得江山之助”（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的上下求索，有酈道元为注释《水经》奔走四方的行止，有鉴真和尚矢志不渝、六渡东瀛的壮举，有徐霞客堪称“中华旅行第一家”的不尽攀登。是他们，连同张骞、慧远、元结、苏舜卿、郑和……俱各以旅游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于光远语，见《世界经济导报》85.11.25）参预了中国古代文化宝库的构建，以自己审美而又创美的举动，开辟了人们拓展视野、愉悦身心的新的天地。它不仅在当时加深了生活的层次，增添了生活的情趣，还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折射出了时代的精神，并且传留、感染和

启迪着世世代代的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和意绪。

这就是旅游史！——一个如此眩人眼目，撩人心旌的力与美、智并健的历程，一片如此富于诱惑力的待开垦的处女地。尽管以往的它就象巫山神女一样，隔着重重云霓，使人若即若离，颇觉朦胧，但今天还是在艳阳辉映之下，半隐半现地向我们展示了它婷婷玉立的身姿。只是，既然它的被感知于世是得力于神往者执着的探觅，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将自己的注意力仅仅停留在对那些脍炙人口的趣闻轶事的欣赏上面。我们要再一次燃点起理性之火，去烛照那神奇的洞天，我们要以一种见微知著、审物究因的思辨目光，去再一次透视那不止一次为我们翻动过的历史篇章，尤其是当时代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地拍打着东方大陆的古老堤岸，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我们进一步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时候。

现在，让我们首先将眼光投诸于洪荒时代吧，就从人类刚刚立起，知道“行”的那一时刻开始……

大矣造化工 万殊莫不均
群籁虽参差 适我莫非亲
——王羲之《兰亭诗》

八极恣游憩 九垓长周旋
——李白《赠嵩山焦炼师》

目 录

- 1 引 子
- 2 朦胧难觉的前夜 (原始)
- 3 迹近神话的滥觞 (三代)
- 4 表为功利的勃兴 (先秦)
- 5 发扬蹈厉的进程 (秦汉)
- 6 著尽风流的场景 (魏晋)
- 7 雄放浩荡的洪流 (隋唐)
- 8 悄静散淡的退潮 (宋元)
- 9 斑斓迷离的回光 (明清)
- 10 后 记

朦胧难觉的前夜

“人猿相揖别”，（毛泽东《贺新郎·读史》）人类系由拉玛古猿变化而来，这一点在稍具历史知识的人来看，当是无疑义的了。只是，我们祖先的第一步究竟由谁迈出，自何而始呢？

面对这样的问题，人们或许会哑然失笑了——须知：岁月渺渺，陈迹难辨，即令在浑沌初分、荒蛮可怕的时代，即令我们的祖先还茹毛饮血、不能言语的时候，人类社会也断不会以只人独身的方式而存在，而有的则只可能是被称之为芸芸众生的杂乱活动着的原始群，那末，设问由谁迈出的第一步不是有点迹近荒唐了么？

的确，对提问者的这种反诘是很有道理的。它至少表明了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否认的模糊现象。只是，在经过对被称为本章题目的“朦胧难觉的前夜”作再一次体味之后，笔者仍还是坚持认为，若要开始中国古代旅游史的叙述，以此也未尝不是一种方式。其所以如此，盖因为历史学毕竟属于概括的科学。在特定的条件下，它可以具体地究查，抽象地回答，用具代表性意义的事件来说明无法详示也无须详示的细节。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便以此种方式开始了中国古代旅游史的叙述，便认定了三皇五帝——这些英雄时代的巨人们率先迈开了中华民族涉渡江河、登攀峻岭、穿越林莽、驰驱旷原的步伐。是神话、是传说，自然更是青史，使他们

得以成为了中华民族祖先的代表，从而也就因此享有了被礼崇为中国古代旅游事业的揭幕人的殊荣。

有巢氏行了没有？回答自然是肯定的，不然，何以能“王天下”呢？须知第一次构木为巢就脱离不了跋涉登攀，至少，他的指挥和参与砍伐曳运树木便要行路。

燧人氏行了没有？回答也是肯定的，不然，何以能为“民悦之”呢？须知第一次钻燧取火就脱离不了跋涉登攀，至少，他的磨制石钻、寻找引火之物便要行路。

神农氏行了没有？回答还是肯定的，不然，何以能“民悦之，使王天下”呢？须知他的“斲木为耜，揉木为耒……以教天下”（《易·系辞》，上两注皆同）就脱离不了登攀跋涉，至少，他的遍尝百草便要走很远很远的路。

自然，以上诸人可谓之最早见之于口碑和文抄的行路之人了。不过，若说到行路之长、行迹之著，则比他们晚一些的大禹要更引人瞩目。据说，他旅行的时间是“居外十三年”，旅行的方式是“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犂”，（《史记》卷二：夏本纪）旅行的条件常常是“沐甚雨、栉疾风”，而旅行之艰苦则更使他的形体也发生了变化，一至于“腓无胈，胫无毛”。（《庄子·天下》）

然而，说到这里，我们却不能不遗憾地指出，他们的这种旅行，仅仅只是行路而已，与我们所要叙述的中国古代旅游史的内容，与旅游这一概念的本义相比较，距离竟是这样远，区别竟是这么分明。而他们本人之于旅游的意趣，感觉又是那么朦胧隔膜，以至可说是一无所知。

有巢氏为什么要行？盖因为他要指挥和参与砍伐和拖曳树木，至于他是否想到了行路会于自己的身心产生愉悦、增

添乐趣，这却是不得而知，至少，我们现在还未找到这方面的记载。

燧人氏为什么要行？盖因为他要磨制石钻，寻找引火之物，至于他是否想到了行路会于自己置身其间的大千世界产生一种影响和一点作用，这却也是不得而知，至少，我们现在还未找到这方面的证据。

神农氏为什么要行？盖因为他要制耜造耒，遍尝百草，至于他是否想到了自己的行路与这里叙述的中国古代旅游史有着发轫的意义，这却更是不得而知，至少，我们现在还未找到这样的片言只字。

说到大禹的行路，那就更明显了。他原本是要治水。正是为此，他方才“行自冀州始”，（《史记》卷二：夏本纪）“置万国”（《庄子·天下》），而“疏九河、沦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孟子·滕文公上》）。

以上都说明了什么呢？很显然，都说明了他们不是为着赏心悦目去行路的，不是为着审美抒情去游历的。他们有的是为了使子民“以避群害”，有的是为了使部众“以化腥臊”（《韩非子·五蠹》），有的是为了使百姓“耕而食、织而衣”（《庄子·盗跖》），这些，就如同女娲的行路是为了采掘补天的五彩之石和伏羲的行路是为了寻找记事的结绳之草一样。要说有什么个人欲求，至多也不过是象大禹那样，“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史记》卷二：夏本纪）。因此，后人也就不能毫无根据地把这些勤劳睿智的祖先说成是流连山色的游客、啸傲湖光的旅子，从而演义出更多一点神奇瑰玮的故事来。

其实，说到时人之行路表现、目的及后果迥然有别于中

国古代旅游史之所叙内容，又何止表现于上述诸人？以舜为例，他“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史记》卷一：五帝本纪）所行之路可谓不短，所至地域也可谓不窄，然而这所有的一切，连同后来的南巡苍梧不返，都无不是为着子民的生计、部落的发展，而难得找出极视听之娱，尽身心之欢的痕迹。就是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不远数千里，风尘扑扑地追至洞庭之山，也是悲恸于他的不幸殒逝，而不是为着一睹古云梦之雄浑壮美的风光。谓予不信？只试看那斑竹上的滴滴泪痕便是二妃内心世界的最好表白和旅行目的的最好说明。

这便是朦胧难觉！是中国古代旅游史滥觞的前夜，是有着五千载文明纪年的中华民族在人类社会的曙光初露之际，于物质欲求与精神向往、行路与审美的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不能违悖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实际过程。一句话，存在决定意识——是相当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极其低下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抑制了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以及舜、禹等人的欲求，使得旅游这种在当时无异是天方夜谭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极其低下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相当恶劣的生存环境——不是吗？且不讲北京天安门前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原始部分所展示的先民的遗物已确凿无误地告诉了我们这一切：那里有考古学家们发掘整理出来的仰韶的骨针、河姆渡的陶器、龙山的收割蚌、良渚的粳稻种、大汶口的取水器、甚至还有因含有锡和铅颜色显得发红的铜块……就是紧挨着这个时代的奴隶社会中的人们也早用文字的形式告诉了我们有关的情况——

“……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蓄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助之备。”（《吕氏春秋·恃君览》）

“长幼侪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缘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气温适，不织不衣。”（《列子·汤问》）

“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复前而不能复后。卧之法法，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白虎通》卷一）

……

够了！仅此便足可见一般了。试想，以时令节气尚未不得区分，山川地域尚不得确认，饮食起居尚不得保证，人伦道德尚不得知晓，又遑论旅游？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等即令有旅行之举，想的也只是构巢、取火、耕种，至于大禹，即令走了更多一些路，到了更宽广的一些地方，也只能是“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海。”（《越绝书》卷十一）

然而，朦胧难觉毕竟不等于混沌一片。既然被称之为前夜，往后下去便定有破晓之时。而且就是比较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诸人之与大禹，我们也会发现他们行路的状况和条件有了很大的差别——前者以神话传说的方式留传于民间，后者则如《诗·大雅·荡》所说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是不容怀疑的；前者的旅行出于我们逻辑地推论，后者的旅行则是见之于史书的记载；前者的旅行多不出群体活动的范围，后者的旅行则遍被九州；前者的旅行自然而然只能依靠刚刚与上肢分工不久的下肢的连续运动，而后者的旅行

则得到了舟车橈輶之助。或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区别呢？还是那句老话：生产力发展了，生存环境也变化了。对此，《易·系辞》曾这样写道——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断木以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

正是这种历史的进步，使得先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欲求也有所扩大，而且随着眼光的进一步拓展和思维的进一步敏锐，朦胧便愈来愈趋近揭晓，各种与旅游相关的事态便相继萌生、出现——

人们有了地域观念，如：“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左传》襄公四年）

人们有了自然崇拜，如：“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诗》）

人们有了审美情趣，如：“艺之兴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中论·艺纪》）

人们有了许多远足的传说，如：夸父逐日、精卫逾海、嫦娥奔月……（见《山海经》）

的确，人类尽管还处在脚步蹒跚、牙牙学语的童年，“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毛泽东《贺新郎·读史》）但经过代复一代的努力，已比过去知道了多得多的事物，已不能满足眼前的一切，已经要求和渴望着行更长的路，到更多的地方，并以此获得对世界的更多的认识和自身精神的更大愉悦。如果不是这样，则夸父何以要与烈日逐走，竟至渴死而不反悔？如果不是这样，则精卫何以要涉逾东海，以致后来不幸殒溺、其精灵衔石填海，矢志不渝？如果不是这样，则嫦娥又何以要扔掉后羿而独自飞升？自然，夸父的逐日和精卫

的逾海更多地确是表现着一种人类敢与大自然搏斗的大无畏的精神，可是嫦娥的奔月却不能不是出于对美好境界的探觅和追求而进行的一次神奇的旅行。试想，如果广寒宫中单只有长生，而没有梦幻一般的天地并带给她瑰丽的遐想，她能下决心步云举霞、飘飘而去么？就是后人感叹“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李商隐《嫦娥》）想也不是指她悔恨绝情后羿，而是就其懊恼寂寞惆怅、极无意趣而言的。

其实，似这样的情况我们还可举出许多。其中最具佐证和说服力的便是对我们祖先的远古图腾——龙、凤的意象的体味。看吧，它们从出现的那一天起，就不是静态的呆板的观照，而恰恰相反，是若飞若腾、如踊如跃，是“一种猛烈的活动过程”，（李泽厚《美的历程》）从而被称之为“龙飞凤舞”。诚然，它们作为图腾所标记和代表的是一种狂热的巫术礼仪活动，但它们其所以最早成为“人心营构之象”（章学诚语），除了其原形是人类常见的蛇、鸟以外，还由于这些生灵是有血有肉的活体，具有爬行和飞腾的功能。正因为它们的运动象征着生命活力的勃发和激进，所以随着先民本身的进步和对外部世界渴求了解的欲望的增加，它们便逐渐改变了以往粗陋的形象，而接受了更能扩展其爬飞功能的其它动物的脚、毛、尾、鳞、须、角，翩然飞舞起来，以至后来变化莫测、气象万千。它之所以产生在远古渔猎时期却又居然能延续、保存到文明年代，它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量从而吸引人们去崇拜、去幻想，与它们张狂而又严谨、热烈而又庄重的动势是分不开的，与它们所象征着的人类渴望着不断开放、举步的精神力量是分不开的。正是这一种动势和精神力量，体现了那充满野性活力的原始的美，体现了中华民族

自初生之际就具有的一种伟大的性格。

以上，便是中国古代旅游活动得能滥觞的前提。只是，话又说回来，正因为它只是前提，而不是滥觞本身，更不是滥觞之后的洪流，所以便显得那么朦胧，那么不可捉摸，那么可忽略不计，而不是后代文人所夸张的“山水之美，古来共谈”。（陶弘景《与谢中书书》）因此，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们比较后来者，在举足的旷远和事功的业绩方面或许不会逊色多少，甚至有的还会因斩棘披荆、草创那“大同”世界而为后人惊叹景仰不已，如嫦娥的丈夫后羿就曾“诛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猼狁，断脩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淮南子·本经训》）然而，走了那么多的路，到过那么多的地方，却到底不能被称之为旅行家。就是他的“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淮南子·览冥训》）与后来周穆王为晤会这位姿容绝世的美丽女神所兴起的那场声势浩壮、神奇瑰玮的遨游亦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所以如此，自然还是为着他所处的条件，他行路的目的，他所表现的精神追求及他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与我们所讨论的内容相去太远了啊！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粢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鹿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耜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韩非子·五蠹》）

这就是历史——包括一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三皇五帝时期的真实社会图景。它与考古工作者所发掘整理出来的石器文化相互映证，为历史科学关于原始社会人类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相当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阐述提供形象化

的文字说明。在这样的背景下，很显然，旅游这一特殊的以异地、业余、享受为主要标志的生活方式要为人类所拥有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尽管如此，必须指出的是，恰恰是随着它的不断改观，人们的生活出现了变化，即令这种变化在一开始确实显得那么微弱、轻细、渺忽，犹如蛛丝马迹……

迹近神话的滥觞

从夏禹迄至商、周，这是旧时史家所谓的“小康”时期。对此，《礼记·礼运》曾这样记叙——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攻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功，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在这里，儒家的传人们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阶级初分、“制度”方立，社会发展迥然有别于大同时期的图景。正是为着“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于是便有“大战于甘”；（《尚书·甘誓》）便有“桀走鸣条”；（《史记》卷二：夏本纪）便有“陈师牧野”；（《史记》卷四：周本纪）也于是便有“禹会诸侯江南”；（《史记》卷二：夏本纪）便有“盘庚迁于殷”（《尚书·盘庚上》）……

的确，上述记载展示了当时社会最为引人瞩目的事件，从而留给了我们以深刻的印象——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人的历史知识体系是以此为框架而建立起来的。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社会生活毕竟是丰富多采的。即使人们尚处在动辄便“血流飘杵”（罗泌《路史》）的野蛮时代，

所面对的也决不仅仅是单一刻板、只能为一种模式所解释的阴森冷酷的世界。既然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人的认识之所以能不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断地调整思维方式，那末，对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状况，我们又为什么要墨守成规、亦步亦趋，象某些人那样，只注意到政治、阴谋、杀戮、血与火的厮杀，而稍稍不能对余外的东西表示一下兴趣呢？固然，非此便不足以理解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足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之一般过程。可是，仅此也是不足以了解文化和文化发展，不足以阐释人类社会发展之全部面貌的。而且，既然是“小康”，便除了嬗替、封国、赐田、祭祀……以外，还有许多为我们感兴趣的東西——亦即有别于图腾时代而又属于中国古代旅游史话题范围的新的事物和现象。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人们欲求的不断扩大和渐次得到满足，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断更新和丰富，自然，也包括以审美为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的旅游的出现。

说欲求，人们肯定首先会想到衣食住行，进而则又会想到声色犬马。也确是，人类就是这样不安分守己。当他们刚刚从那可怕的洪荒时代挣脱出来，当他们还谈不上根本摆脱洪水猛兽的加害，当他们刚刚依靠由经过磨制的石器和非常粗笨的青铜器混合而成的工具谋取到一点少得可怜的剩余产品时，他们（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便产生了遏止不住的生理和心理的欲望，要求一尽食色视听之娱——

他们沉溺于饮酒。酒这玩意儿据说是夏人杜康发明的。文献上说：“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许慎《说文》）称为“稷之粘者”，为高粱一类的谷物。而高粱酿

造的酒自然是好酒。既如此，面对那醇厚清亮、甘冽芳香的液体，时人便忍不住露出了贪馋不已的嘴脸，以至上下嗜饮，酗酒成风，结果便是“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尚书·微子》）便是“……嗣王酣身……诞惟厥纵淫佚失于非彝……庶群自酒，腥闻在上。”（《尚书·酒诰》）后人常用深恶痛绝的口吻斥责“纣作酒池、肉林”，殊不知他只是以万乘之尊，有条件走得最远一些罢了。其实，只要翻翻史籍，就会发现吃喝之风如同巫风一样，在当时是何等盛行。这正如墨子所说：“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墨子·非味》）而了解了这一些，我们方才对青铜器物上的饕餮形象的符号意义，对它所表现出的狞厉的美会有更多的新的认识。

他们喜好歌舞。尽管这时的歌舞脱胎于巫求礼仪还没有多久，很多地方表现的还是与其氏族、部落、邦国的兴衰命运直接相关的心理活动，是一种浓缩、积淀、析凝着原始人群的情感、思想、信仰和期望的形体表演，但不可否认，随着历史的进步，随着原始图腾的逐渐让位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活动，它们便更多地象唐人杜佑所说的“乐之在耳曰声，在目曰容”，（《通典》卷一四五）从而具有了审美的效用。正是这种以生意盎然、稚气可掬的特点出现，而又没有完全告别那种如火如荼、如醉如狂的巫礼风貌的民歌俗舞，使时人能“咏其声”，“动其容”，（《乐记·乐象》）从而在视听上获得了满足，在精神上产生了愉悦。自然，文献所载彼时之歌舞如“大濩”、“晨露”、“九招”、“六列”、“桑林”之类或不可信，但“恒舞于宫，酣歌于室”（《墨子·非乐》及古文《尚书·伊训补》）的现象，却是随处可见的。正是为着时风所